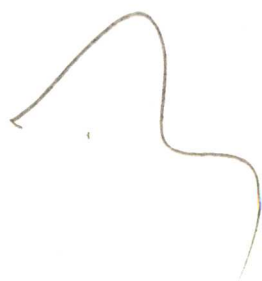


谢非 著

一个在校大学生的读书札记

我看东坡本色



東方出版社

I106

109

2007

谢非著

一个在校大学生的读书札记

我看东坡本色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看东坡本色 —— 一个在校大学生的读书札记 / 谢非 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7.2

ISBN: 978-7-5060-2018-3

I. 我… II. 谢… III. 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9144 号

我看东坡本色 —— 一个在校大学生的读书札记

WO KAN DONGPO BENSE

作 者: 谢 非

责任编辑: 许运娜

书 号: ISBN: 978-7-5060-2018-3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地 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 址: www.peoplepress.net

发行电话: (010)65257256 65136418 65243233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装帧设计: 盛世光华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2 月 1 版 2007 年 2 月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6.25

定 价: 1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谢冕

现代社会是一个推崇时尚的社会。青年人喜欢求新求异，自然也就成为追求时尚的主体。喜好时尚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不加辨别，一味追求时髦，就难免随波逐流，失去自我。现代社会又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不加辨别，照单全收，也会失去自我。

我认为，青年人在这个时尚和多元的社会里要保持自我而不至于迷失，一是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二是要有判断能力。要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途径是多读书。有关读书的重要性，古今中外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外国最著名的大概是培根《论读书》中的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读书陶冶个性’。不仅如此，心智上的任何障碍，无不可以通过方法得当的读书学习来消除。”中

国古代有关读书的论述就更多了。比如，宋代大学者欧阳修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礼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明代郑心材说过：“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古人大抵把读书的功效归结为立德、增智、明理三条。所谓立德是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符合道德规范，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也有贡献的人。所谓增智就是丰富知识，增长才干。所谓明理，就是明白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现在我们身处市场经济社会和网络社会，沉下心来，多读读书，对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避免浮躁的心态是大有裨益的。

在读书的过程中，哪些书该读，哪些书不该读，需要加以甄别。哪些书要精读，哪些书要泛读，也应该注意。我认为，年青人既要读当代的一些优秀书籍，也应该读一些人类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经典著作。读当代的一些优秀书籍，能够使我们把握时代的脉搏；读经典著作则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把握人类思想发展、文学艺术发展的脉络，能够使我们具有历史感，思想也会变得深刻一些。此外，读书还要做到既“能入”，也“能出”。“能入”是要能沉下来，钻进去；“能出”是要能做到触类旁通，有见解，有看法，并能学以致用，解决现实问题。要避免青年人常见的喜欢耽于幻想、坐而论道的弊病。

谢非同学是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的在校大学生。现在像他这样的年龄，许多是属于“粉丝”类，往往是以追求时尚为乐、以追求时尚为荣的。但他却能够远离时尚之外，静下心来，潜心研究中外名著，并写出了《我看东坡本色》书稿。一个在校大学生在短短三年时间里，能读这么多书，写下这么多论文，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他的这种以读书为乐、以研究

问题为乐的特点，对现在在校大学生来说，已经是不多见了。这是他难得之处，也是可贵之处。

谢非同学《我看东坡本色》一书中的文章，涉及古今中外文学的多个领域。他的论文体现了一个年轻人的率真，视野十分开阔，常有独到的分析和见解，有一种他这个年龄不多见的少年持重的特点。从这些论文中我们能看到谢非同学的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和钻研精神，以及他在文学研究上难得的潜质，这是我读他的书稿后最感到欣喜的地方。我相信，如果他能够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加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假以时日，一定会在学术路上有所开拓、有所成就。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在校大学生出版小说集的有一些，但出版论文集的还很少，东方出版社要出版谢同学的书稿，约我写序，我欣然同意，其意是希望在校大学生能多一些像谢非这样的学生，沉下心来多研究问题；希望出版社通过推介优秀的大学生论文，倡导研究风气；也希望整个社会能沉下来，少一些浮躁，多研究现实问题。现在，一些城市举办了读书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殷切希望我们的社会里能形成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社会风尚，不断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推动社会进步。

是为序。

目 录

- 论陶渊明的“风流” / ●
- 我看东坡本色——关于苏轼的个性 / ●
- 迎春和李纨 / ●
- 《诗》三百之我见（以“国风”为主） / ●
- 我对孔子删诗这一问题的看法 / ●
- 读曹植《赠白马王彪》有感 / ●
- 杜甫论李白诗述评 / ●
- 小议李白诗中的议论 / ●
- 王蒙作品中不变的理想主义 / ●

沈从文与《大公报》的文艺副刊 / 95

散文与散文诗之比较 / 101

形成中国民间文学与欧洲民间文学差距的原因分析 / 109

试论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与传统基督教

博爱观念的关系 / 111

《巴黎圣母院》与《艾凡赫》之比较 / 115

论卡夫卡的“小”作品 / 117

托尔斯泰与意识流 / 119

霍邱县史考 / 125

論
陶
淵
明
的

『風流』



论 陶 渊 明 的

“风 流”

冯友兰先生在《论风流》^①一文中将魏晋名士的特征概括为“玄心、洞见、妙赏、深情”。按照冯老的观点，所谓“名士”，必须具备一种美，即“风流”，而构成风流的条件就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陶渊明在他所处的时代虽然算不上出身名门望族，也不曾受到时人的普遍景仰，然而应该也算是小有名气，南朝人修撰的《宋书》将其列入《隐逸传》，唐人编的《晋书》、《南史》也都将他收入《隐逸传》中，可见陶公生前尽管没有大的名望，但也算得上是名士，也应有其“风流”之处。不过我想（大多数人也应该会有同感吧）陶公在当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不论在文学上还是人生选择上都与众不同，他的呼声，应者寥寥，他的“风流”也应该是别有特色的。

最先有必要提出来的是关于陶渊明的基本信仰（亦可称为世界观）的问题。因为所谓“魏晋风流”基本上是道家的东西

^① 这篇文章收入冯老先生的《三松堂学术论文集》，第609—6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当然已经不是最初春秋战国时代的道家了，冯老称之为“新道家”，指的是公元三、四世纪的“玄学”，“是道家的继续”^①。提起“玄学”自然令人想到冯老所说构成风流四要件中第一位的“玄心”。不错，玄心是由玄学而来的，一个人正因为研究、信奉了玄学才会有玄心，就好比正因为信奉了马克思主义才会有共产主义的理想一样。魏晋士人的玄心不会凭空而来，一定是由一种与两汉儒学不同的、全新的信仰和理论诱发而来的。公元三、四世纪，汉儒式微，道家复兴，就是在这种时候“魏晋风流”出现了，因此这个结论应该是确定无疑的：风流的人、有玄心的人，一定是信奉道家思想的人——然而，有着别具一格风流特质的陶渊明所抱的是道家思想吗？

关于这个问题，历代学者颇有争论，但是，“在封建社会，把陶渊明归入儒家的占绝大多数。”^②比较有名的说法如宋代理学家陆九渊声称：“李白、杜甫、陶渊明皆有志于吾道。”（《象山全集》卷三十四）明安磐言：“汉、魏以来，知道孔子而有志：学者渊明也。”（《颐山诗话》）而清朝沈德潜、李光地二人更是提出了一条认定陶公为儒家的极有说服力的论据，沈言“晋人诗旷达者征引老、庄，繁缚者征引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李言“观每章中卷卷六籍”。这的确是一个关键之处，我在读陶的诗文时也注意到了。粗略统计一下，我发现陶公所用儒道两家典籍次数悬殊之大真是出人意料：他几乎根本不用《老子》、《庄子》，而专用“六经”，尤以《论语》为多，《礼记》、《诗经》次之，间或采《尚书》之语、《左传》之事。陶公必然熟读儒家经典才能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十九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等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历代陶渊明研究情况简介”（前言），第5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将这些典故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他本人明确说过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可见其从小受的教育是儒家的，他的志向也是儒家的。

有两首诗要特别提出来，一首是《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
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
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一首是《饮酒》其二十：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
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
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
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
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
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
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这两首诗真是太特别了，我们从中看到的陶渊明是一个坚贞不渝的孔子的信徒。“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这是圣人的教诲，他奉之为最高准则；他“转欲志长勤”是因为“瞻望

邈难逮”，“行者无问津”，最终“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只是无奈的选择；他怀念伏羲、神农时淳朴安定的社会，颂扬孔子汲汲救世的努力，肯定孔子“弥缝使其淳”、“礼乐暂得新”的成就，慨叹自己处在一个“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的时代，在《老子》、《庄子》被奉为“经”的时代陶渊明竟然在为深受置疑的儒家“六经”大声疾呼鸣不平，这在当时应该也算是独一无二的“怪异”之举吧。他的思想与时代的主流格格不入，时代的走向与他的思想大相径庭，所以他深深地苦闷。正因为这种苦闷他才归隐，才借酒浇愁，他最根本的悲哀是儒家的式微，大同世界的渺茫。

以此来看，陶渊明不啻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儒生，他的归隐绝不是道家的“无为而治”、远离尘世，而是奉行了“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条。既然社会黑暗、世风日下，他只好退而求其次，转为追求自己个人道德的纯洁。

因此我认为陶渊明的根本信仰是儒家的，但也不否认他有玄心，他“风流”，也就是说陶公的思想本质是儒家的，但后来又杂入许多道家的东西。究其原因，可引用鲁迅先生的一段话：

“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①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②何尝不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

① 嵇康应为司马昭所杀，此处为鲁迅误记。这里引用时遵循原文，特此说明。

② 同上。

如此利用，褻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①他们要迁执得多。”^②

鲁迅先生这番话实在是道破真谛之语！嵇康、阮籍同为“竹林七贤”之核心人物，一个服药，一个饮酒，均为放浪形骸、不拘礼法之辈，该算道家而不是儒家了吧，但其实不然，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执着于礼法、更忠于儒教的人了。他们放浪形骸，做出种种惊世骇俗的古怪之举，正是因为他们对儒家礼乐沦丧的悲哀比那些看似“正派”的人大得多，他们是发自内心地悲恸，痛到骨髓里了，伤心得失去理智、近于疯狂，在极度绝望中选择了一种近乎颓废的方法来抗争强权的恶势力。陶渊明的思想和嵇阮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他没有选择放浪形骸、惊世骇俗的行为来反抗，这应该与他的性格有关。陶渊明的性格是温和的，所以他选择了回归大自然，在躬耕读书中保持内心的平静，使自己的灵魂不受世俗污染的侵扰。陶渊明与嵇康、阮籍同是理想主义者——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曾有人说：陶渊明不断地探索人怎样生活才是有意义的，怎样活着才最完美。我十分赞同这个说法。我认为，陶渊明思想上的这一特点，正是他的“风流”在同时代人中独树一帜、与众不同的最重要的原因。

前面已经说过，嵇康、阮籍等人的“反叛礼教”其实正是出于对礼教的无限忠诚，而所谓“魏晋风流”正是自嵇阮这一

① 同上。

②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收入《而已集》，见《鲁迅集》第三卷，第501—5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1996年翻印本）。

代人开始的，他们可以说是第一代“风流人物”，正是这些人重新发现了道家，开创了“玄学”，“新道家”于是兴起。而儒家思想在那时并没有衰微，“新道家”并非反对儒家，正如冯友兰老先生所说：“新道家，至少有一大部分新道家，仍然认为孔子是最大的圣人。……有些重要的儒家经典，新道家已经接受了，只是在接受过程中按照老子、庄子的精神对它们重新作了解释。……新道家，尽管是道家，却认为孔子甚至比老子、庄子更伟大。他们认为，孔子没有说忘，因为他已经忘了忘；孔子也没有说无欲，因为他已经无欲于无欲。”^①所以我觉得最初的魏晋名士们所质疑的是汉代的儒学，而不是儒家本身，道家思想是那些面对继东周春秋时代之后又一轮“礼崩乐坏”的残酷现实有济世之心而又无回天之术的人寻求到的精神安慰。

这是汉末曹魏时代的事，而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已是四世纪末、五世纪初，距阮籍、嵇康等第一代风流人物已有一百六七十年之遥。按四十年一代人计算，从嵇、阮的时代到陶渊明的时代相隔了至少四代人，这中间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的变化一定非常大，东晋时期最“标准”、最“地道”、最“风流”的名士未必知道当初“竹林七贤”是怎样生活和思想的，他们学的多是那最初一代风流名士们的表面形式，已经不能了解诸位先贤思想的精髓。并不是说东晋名士们就没有思想、徒有外表，只是我认为东晋士人的所谓“风流”已经和汉末魏晋的“风流”大有不同，后世学者绝不可概言之。东晋南朝的晚生后辈们把前代名士不得以为之的信仰和行为当作了真正的追求、最终的目的，经过了几代人的渐变，可以说周孔彻底告退、老庄全面繁荣。但这种“繁荣”已经偏离了开辟者最初的道路了。而陶渊明，我认为他是那个时代少数几个继承了第一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十九章。

代风流名士遗志的人中的一位，但他既然生于东晋，就不可能不受到时代风气的熏陶，因此他在最初满怀儒家理想热情的時候对于出世归隐、纵情山水的道家追求就不是没有感情。从一开始，入世和归隐、功名和淡泊就构成了他内心中一种难以化解的矛盾。这两股力量的冲突在他的前半生尤为激烈，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他的反复入世为官又反复辞官归隐，他总是徘徊于出世和归隐之间，归隐时想着出仕，出仕后又想归隐，我认为这正是他内心中儒家的本质与道家的因素之间冲突的表现。

陶公玄心之独特正是在这种儒道二家之冲突融合中体现出来的。他的归隐是真正的归隐，六朝时代隐士极多，且做隐士似乎也算一种时尚，但著名人物中真正归隐的恐怕只有陶渊明一人。他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从其作品中找到一个大概的轨迹：当他归隐的初期，可能是很痛苦的，毕竟，理想破灭对于一个有着执着追求的人来说几乎等于是精神的死亡。他感叹“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杂诗》其一），想到“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可见这时他心中不平静，满怀着冲突；“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杂诗》其八），这时的陶渊明眼中田园生活还没有那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的浪漫色彩，但后来他超越了，洞见到生活之真谛，达到了一种超脱世间的境界，“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三首·神释》），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这诗所表示底（的）乐，是超乎哀乐底（的）乐。这首诗表示最高底（的）玄心，亦表现最大底（的）风流”。^①

① 冯友兰：《论风流》，《三松堂学术论文集》，第6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我看 东坡本色

——
关于苏轼的个性

